

# 从《鲁拜集》看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通感”策略

毕婷婷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摘要】**“通感”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在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的创作和鉴赏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好的诗歌翻译犹如文学艺术的再创造,而“通感”这种“以感觉译感觉”策略的运用,能使读者通过联想身临其境,亲见其景,从而内心得到感染,与原作产生共鸣。郭沫若译《鲁拜集》,无论是译者与作者,还是译诗与原诗,个中转变都因“通感”策略的灵活运用而无一丝牵强痕迹,自然天成。这对当前的诗歌翻译理论研究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又有助于推动散文、诗歌等“美化文学”翻译实践的发展。

**【关键词】**“通感”策略;诗歌翻译;《鲁拜集》;郭沫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3-0014-03

## 一、引言

随着对外国诗的了解越来越深入,诗歌译者越来越不满足于不反映原诗形式的翻译,要求尽可能传达原诗内容与形式的一切信息。然而,过分强调忠实于原诗的内容与形式必然会忽略影响译诗的其他因素,以至于画蛇添足,造成译诗精神的流失。郭沫若以新诗震撼文坛,作品直抵人的内心深处,他认为“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把捉之风韵”<sup>[1](P260)</sup>,因此在《鲁拜集》的翻译过程中,他没有刻意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对等,而是与此之外,运用了“通感”的策略,以求不失原作“风韵”。“通感”,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指把不同感官的感觉沟通起来,借联想引起感觉转移,“以感觉写感觉”,在翻译中尤其表现为不同主体间感觉的互通,“以感觉译感觉”。如此一来,郭氏不仅要以创作者的身份走进原诗,仿佛他就是原作者,亲自经历原诗中的一事一物,感慨原作者的情感,同时还要以翻译家的身份走出来,以另一种语言,甚至另一种方式将所体验的感觉跃然纸上。这一过程贯穿于原诗的选取、诗歌内容和诗歌形式的翻译之中,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对郭译《鲁拜集》中的“通感”策略进行描述性研究,以期总结该策略的运用方法,为诗歌、散文等“美化文学”翻译实践提供指导思想。

## 二、“通感”策略在原诗选取上的体现

“以感觉译感觉”是“通感”策略运用于翻译过程中的最大特色,它要求“译者与作者心灵相通、志趣相投、情感相宜,同时又与作品思想吻合、爱憎共生、审美一致”<sup>[2](P1)</sup>。郭沫若从开始翻译活动起,就选择那些与时代和自己思想相吻合的作家作品,将时代的需求和自身的个性、情感寄托于翻译作品之

中,作者与译者间感觉的互通,原诗与译诗情感的交融,无疑使翻译作品堪称一绝。

《鲁拜集》是郭沫若译 Rubaiyat 所用名,原为波斯诗人莪默·伽亚默所著,后由英国文人菲茨杰拉德译出,郭沫若所译《鲁拜集》使用的就是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第四版。作为公认的创造社领袖人物,郭氏尤其强调译者主观感情的投入。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广泛接触西方的文学作品,涉猎了浪漫主义及包括唯美主义等在内的世纪末思潮,追求民主自由,解放个性,张扬自我,更是对祖国充满了美好幻想,然而“五四”以后,中国社会黑暗腐败,回国后的郭沫若陷入歧路的彷徨,对现实中的一切都感到憎恶和痛恨。伽亚默的生活与郭氏有所相似,“他坚持宣传自由思想,反对教会的烦琐哲学和神秘主义,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现实的黑暗加之反动势力的猖獗,使伽亚默产生浓重的悲观厌世情绪”<sup>[3](P39)</sup>。无论是郭沫若的彷徨,还是伽亚默的厌世,都源于对现实社会的失望无助,此时他们二人内心苦闷的心境是一致的,惆怅的感觉是互通的,郭氏很容易走进伽亚默的内心世界,接受其悲观心理,和他产生共鸣。这种高度的契合,也就是译者与作者间“通感”的体现,译者带着自身的感受体验原作者的感受,以原作者的感受渲染自身的感受,从而“以感觉译感觉”,创造出与原文精神和风格一致的译作。

“要翻译一部作品,必须明了作者的思想;还不够,更须自己走入原作中,和书中的人物一同哭一同笑”<sup>[4](P42)</sup>,郭沫若除了与伽亚默在思想上产生“通感”外,还从其作品《鲁拜集》中找到了内心苦闷宣泄的方式——翻译,实现译者与原作的“通感”。《鲁

收稿日期:2013-07-06

作者简介:毕婷婷(1989-),女,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翻译。

拜集》所宣扬的是反对宗教迷信的主题和狂放不羁的浪漫主义风格,而这与郭沫若要求个性解放的叛逆精神不论是在思想情调,主题指向,还是文体风格上,都十分合拍。郭氏的思想、情感,甚至生活体验在诗中找到了最适合的印证,内心世界不禁为之一颤,无限的情感随即悄然而至,支配了译者的思想,从而有了翻译的冲动,原诗的情感化作译者此时的内心感受跃然纸上。《鲁拜集》是我国现代翻译史上第一部完整译出的抒情诗集,同时,也是第一本以新诗形式译出的诗集,郭沫若成功地将“通感”策略运用于翻译过程之中,一方面使自身的苦闷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泄,另一方面也让读者从真正意义上领略到了原作的风采并产生心灵的共鸣。因此,就《鲁拜集》的翻译选材来说,译者与作者及原诗间的“通感”无疑博得了众人的认可,在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及实践中别树一帜。

### 三、译诗内容的“通感”

英文词汇所创造的意境和中文词汇所创造的意境相差甚大,因此诗歌翻译若要忠实于原著,是很难完全重复原文的语境的。况且一个词汇在不同语境下亦有多种含义,往往不同语种之间,很难把词汇延伸都翻译到,如果精确于词义,必然会造成其它方面的损失,最终影响到原诗意境的传达。郭沫若的“通感”策略在诗歌内容的翻译中似乎巧妙地避开了这一正面交锋,他曾强调“风不是从天外来的,诗不是从心外来的,不是从心坎里流露出的诗,通不是真正的诗”<sup>[51]P4051</sup>,可见,郭沫若在诗歌翻译过程中所重视的除了忠实,更多的是一份心与心的交流,正是在这份交流之中,郭沫若的“通感”策略开始发挥作用。《鲁拜集》中似乎存在不少这样的词眼:

Wake! For the sun, who scatter'd into flight,  
The Stars before him from the Field of Night,  
Drives Night along with them from Heav'n, and strikes,

The Sultan's Turret with a Shaft of Light.

醒啊! 太阳驱散了群星,

暗夜从空中逃遁,

灿烂的金箭,

射中了苏丹的高瓴。<sup>[61]P3</sup>

短短一节诗中,似乎已流露出了无限情感,“群星”、“逃遁”、“灿烂”、“高瓴”这些词眼蕴含着丰富的感情色彩,这于原诗的单个词语是无法体现的,然而,这些情感又是原诗字句的背后所要表达的。

此时,郭沫若的“通感”策略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原诗隐形的情感激起了其内心的情绪,而变得一触即发,不可收拾。正是诗歌所传达的内容与郭氏此时的心境相互交融,难分彼此,译者以彼时的感觉译原诗的感觉,所创造的意境才加铸了原诗风韵的升华。又如“醒呀!”一词,极具力度,饱含情绪,犹如鲁迅口中的“呐喊”,足以唤醒麻木的民众,冲出铁铸的屋子,仿佛原诗就是为当时的民众精心创作一般。

这样的“通感”词眼通篇皆是,再如以“唱醜”译原文的“incarnadine”、以“春阳”译“spring”、以“飘堕”译“falling”、以“酣战”译“bluster”、以及以“深梦”译“sleep”等等,这些词语个个都感情丰富,丝毫不因语言的转化而丧失原诗的意境,并且这些精心翻译的词语无一不与诗人内心的真实情感紧密相连。而郭氏也恰好借此诗将自身的情感记录下来,他将原诗的情感经过理解,融合到自己的情感中,又将自身的感受寄于原诗表达出来。这种无意识的“通感”在这些满腹色彩的词语上得到充分体现,让读者临近,感受,沉醉。

郭译《鲁拜集》的“通感”策略似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所客串。原诗的精妙,经过他的思考,脱胎换骨,以最能体现译入语语境的语言展现出来。其中,他的这份思考,自然融入了两种不同文化积淀下语言的互通,才得以成形,毕竟原诗极具异国特色的情调是不能轻易动辄的。不过,他的这种“通感”式处理总体上还是将原诗主旨和读者心灵沟通到了一起:

Each morn a thousand roses brings, you say;

Yes, but where leaves the rose of yesterday?

君言然哉:朝朝有千朵蔷薇带来;

可是昨朝的蔷薇而今安在?<sup>[61]P111</sup>

“君言然哉”这种说法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熏陶已被赋予了特殊的情愫,读者犹如见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哲人,思虑着人生的变迁。原诗“you say”虽貌似平淡无奇,但联系语境,诗人亦是想表达圣人感慨之意。如此一来,原诗与译诗的交流在传统字眼“君言然哉”上找到契合点,从而流露出无限的情怀。同样,“而今安在”这种传统说法,也是郭沫若“通感”策略的折中之果。他根据语境,由“leaves”一词找到“而今安在”,一面释译着原诗的哲理,一面倾诉着自身的无奈,这种用心译出的文字诗意更浓、更烈。

Whether at Naishapur or Babylon,

Whether the cup with sweet or bitter run;

莫问是纳霞堡或在巴比伦，  
莫问杯中是苦汁或是芳醇；<sup>[6]P100</sup>

“莫问”一词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从言语层次上看，它与异域地名“纳霞堡”、“巴比伦”安排在一起，略显刺眼，有点奇怪。然而从情感层面上细啄，恰恰是“莫问”二字才将诗意抬高。郭沫若之所以采取“通感”策略是因为他关注全诗的情，此时便不由自主地使用了这些中国独有的传统辞藻，而这些辞藻又加深了诗中的情感，使译诗同样成为一首真正的诗，不为原诗所羁绊。

#### 四、译诗形式的通感

菲氏 Rubaiyat 之所以成功，除内容的绝妙，还恰恰得益于“形似”，即引进了具有东方色彩的 Rubaiyi 来做具有异国情调内容的载体。而郭沫若译《鲁拜集》的成功，似乎只在“神似”，不求“形似”。

And, as the Cock crew, those who stood before  
The tavern shouted—“Open then the door!  
You know how little while we have to stay,  
And, once departed, may return no more.”

四野正在鸡鸣，  
人们在茅店之间叩问——  
“开门罢！我们只得羁留片时，  
一朝去后，怕就不再回程。”<sup>[6]P51</sup>

原诗是一首典型的英语四行诗，它的格律是每首四行，每行由十个音节构成五个音步，而且音步大多由先轻后重的两个音节合成，此外，诗中一、二、四行末尾单词“before”“door”“more”押一个韵，句式整齐，节奏明朗，独特而严谨的 Rubaiyat 因此而独具一格。郭沫若翻译《鲁拜集》自然清楚 Rubaiyat 的形式特点，不可能忽略这一奇特之处，然而纵观郭氏的译诗，的确是“不拘于形式”的翻译，向着自身所推崇的“自由诗”发展。虽然行数与原诗等同，但每行的字数旋差较大，而且原诗较为引人注目的尾韵在郭氏的译诗中也失去了踪影。人们不禁质疑郭氏的翻译是否丧失了原诗的特色。然而，“汉语诗歌中的停顿与英语诗歌中的音步或顿并不相同，汉语里面一个字一个音，但在停顿方面五言诗又是二二一的停顿，这与英语中十音节形成的抑扬五步有了根本的不同”<sup>[7]P236</sup>，因此，迁就形式的翻译并不会比用现代白话自由体翻译更能接近原诗。相反，郭沫若对原诗透彻理解，以感觉译感觉，自然

无缚的行文译出的文字画面感更强，意思更加明确，从而原诗的情感更有力度。再者，郭沫若对于原诗形式的把握，感性地将其译成或自由或文言或离骚的诗体，强调的是译者的主观感觉，感觉对了，原诗的感情自然也就随着译者的笔尖流露出来，形式只能服务于原诗情感，成为一个助推器，而不是绊脚石。此外，《鲁拜集》的“通感”策略在形式的处理上还兼顾着译者的审美效果和读者的接受效果：

树荫下放着一卷诗章，  
一瓶葡萄美酒，一点干粮，  
有你在这荒原中傍我欢歌——  
荒原呀，啊，便是天堂！<sup>[6]P141</sup>

这里，郭沫若的自然章写刻画了一幅美好的场景，不仅传达了原诗中的和谐氛围，还营造了一种无形的“形”，这种“形”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美，画面美、音韵美、和谐美。郭氏认识到了原诗中的这些美，但中文的形式会在这些美中掀起一丝涟漪，破坏这份诗味。王宏印曾在《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一书中提到，“完全丧失诗味的译诗，即使格律体制与原诗一模一样，严丝无缝，语义句句准确，和原诗丝毫不爽，也是没有多少文学价值的”<sup>[8]P152</sup>。为了顾及原诗的情，自身对美的遐想以及读者对这份美的接受，他只得换种形式，而恰恰是原诗形式的牺牲，才换来了另一番青出于蓝的风貌。可见，郭沫若的“通感”策略在形式的取舍上打了漂亮的一仗。

#### 五、结束语

诗歌翻译中的“通感”策略强调的是以译者此时的感受传达出原诗的神韵，这就必然要求译者充分投入自身的主观感情，与原诗、原作者互相沟通，互相感染。从《鲁拜集》的译文来看，郭氏与伽亚默的相同处境，郭氏需求与原诗精神的一拍即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郭沫若的主观思想经过一番徘徊挣扎，最终舍了局部，换来了全局的风韵，使译诗成了真正的诗，足以打动人心的诗。因此，在翻译诗歌的过程中，忠实只是必要而非唯一的标准，译者应立足于翻译的实际，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把握原诗的精神，再以最自然流畅的文字将原诗重现出来。郭沫若在《鲁拜集》中的“通感”策略值得重思，以纠正当前诗歌翻译实践中强调一味忠实的偏激思想。

####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杨平,谭春林.论译者的移情——以郭沫若的翻译和创造为例[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2007.6.

(下转 20 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转引自何日丹.电视文字语言写作[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5:8.
- [2]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6:22.
- [3]陈少波.电视纪录片解说词创作的审美选择[J].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4.

## Rhetoric Aesthetics of the Television Documentary’s Commentary ——With Wild China’s Commentary as an Example

KE Juan-juan, LI Jing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2)*

**Abstract:** The television documentary’s commentary is one of the main elements of documentary. With its special advantages not only of sound language role played to convey information, but also as a rhetorical text and took on a different kind of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rhetoric. It mainly includes five areas. They are the documentary, images, artistic conception, speculation and logic.

**Key words:** TV Documentary; Commentary; Rhetoric; Aesthetic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 16 页)

- [3]袁荻涌.郭沫若为什么要翻译《鲁拜集》[J].郭沫若学刊,1990.10.
- [4]茅盾.“媒婆”与“处女”[A].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5]郭沫若.《雪莱诗选》小序[A].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6]郭沫若.鲁拜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7]戚立强.译坛异军——创造社翻译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8]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 The Study of Synaesthesia from Guo Moruo’s Poetry Translation on the Case of Rubaiyat

BI Ting-t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Abstract:** Synaesthesia, a mental phenomen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iterature and art, especially in the cre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poetry. Ingenious translation of poetry seems like the recre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synaesthesia, the strategy of translating by similar feelings, can make readers immersive as if they were in the scene through imagination, thus they get infected and resonate with the original. In Guo Moruo’s translation of Rubaiyat, all the shifts, whether between writer and translator, or the original work and the translated work, are natural and flexible due to the application of synaesthesia. This has an academic value in studying poetic translation theory and also help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prose, poetry and other prettified literature.

**Key words:** Synaesthesia; Poetry Translation; Rubaiyat; Guo Moruo

(责任编辑:张俊之)